



智慧的海洋

大跃进杂文选 第三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智 慧 的 海 洋

大跃进杂文选

第三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国的政治、經济、文化各个战綫，都出現了空前的大跃进的气象。反映我們的大跃进的生活的文艺創作，也大量地涌現了出来。而这个时期的杂文也是特別活跃的。我們特将最近以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的这方面的杂文收集起来，編成“大跃进杂文选第一集”，以后还要繼續編印第二集、第三集等集。这些杂文都写得生动活泼、思想敏銳，并和我們大跃进的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帮助我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做，飞跃前进。

(北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951 字數 48,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 $2\frac{11}{16}$ 插頁 4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册

定价(6)0.25 元

目 次

杂谈文艺工作大跃进(四则)·····	荃 麟 (1)
智慧的海洋·····	迟寥洲 (14)
谈“弄斧”·····	洪 林 (16)
谁最有才能? ·····	亦 辛 (18)
没有过不去的火烙山·····	郑 仁 (21)
谁最聪明, 谁最愚蠢? ·····	林之春 (23)
雄心惊得专家叹! ·····	姚文元 (25)
从工人学哲学想起的·····	于尚思 (28)
要多想, 多讨论! ·····	谭清露 (31)
敢想敢做就能出粮食·····	燕遇明 (34)
同帝国主义较量! ·····	闻 山 (37)
谦逊是对于真理的尊重·····	何 明 (42)
是钢不是沙·····	伊 默 (44)
粗中有细·····	郑 仁 (47)
科学的标准·····	公 羊 (49)
谈“条件”·····	越 清 (52)
共产主义者的时间观念·····	一 丁 (54)
从“冷冷清清”谈起·····	振 之 (57)
数字的诗·····	芷 汀 (59)

永无止境.....	黎少岑 (63)
到处插红旗!	梁汝怀 (66)
破“假洋鬼子”.....	张春桥 (69)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张春桥 (73)
文学上的观潮派.....	馬鉄丁 (77)
“决心大变”頌.....	张春桥 (79)
不要怕.....	姚文元 (82)

雜談文艺工作大跃进(四則)

荃 麟

一九二八年，高尔基在給庫爾斯克的紅軍戰士們的一封信(見文艺报第5期)中說：“我曾經想过——現在还是想——要看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劳动和創造的英雄，都成为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建設者。”又說，“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达到这一点。”高尔基的理想不仅在苏联早已实现，在我国新社会中，也成了现实了。目前我国生产战綫和文化战綫上的大跃进，充分地証明了高尔基的預言。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才能达到那样高涨的程度，物質生产和精神生产才能获得那样迅速和广闊的发展。

在这新形势下，文学艺术工作也要大跃进，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事情。

可是，在这热火朝天的日子里，也仍然会有些人站在旁边，指手划脚的在怀疑或嘲笑。他們說，文学艺术是种細致的精神劳动，是精雕細琢的工作，是否也可能跟物質生产一样来个大跃进呢？馬克思不是說过，艺术生产与

物質生产的不平衡嗎？不是說过艺术的某些繁荣时期，并不是与社会底一般发展相适应嗎？那末随着生产战线的大跃进，是否一定会相适应地出现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呢？而現在这种做法又是否有点象赶浪头呢？

对于这种書呆子式的怀疑，或者带有修正主义臭味的嘲笑，是應該首先予以駁斥的。

物質生产和精神劳动当然是有区别的。做小說、写詩歌决不相当于炼鋼鉄、开煤矿，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但这只是劳动性質的区别，这种区别只决定它們工作方式与方法的不同。在大跃进中，文学艺术工作当然也要按照它本身的規律去发展，这是无可爭辯的。但是决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根据来怀疑或否定文学艺术大跃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地存在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仍然是修正主义者片面地強調艺术特征，否認政治和艺术关系的老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無論如何总是工人阶级革命机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当这个庞大的革命机器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大轉动的时候，文学艺术这个齒輪和螺絲釘有什么理由能够不跟着它加速地轉动起来呢？

文学艺术的跃进，不但現在有，过去历史上也有过。各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經出現过某些艺术繁荣的时期。例如我国的唐宋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英国的依丽莎白时代，以及十九世紀的法国和俄国文学繁荣时代等等，都可以說是文学艺术的跃进时代。不过从前文学艺术的性質和我們現在文学艺术的性質是不同的，从前的

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和我們現在不同的。从前的某些艺术繁荣的时期，确如馬克思所說，“并不是与社会底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說构成社会組織骨干底一般物質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这是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在那些时代中，物質生产是掌握在剝削阶级的手里，因而和精神生产經常处于敌对的矛盾状态之中，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精神发展的某些部門，特别是对艺术，对詩，存在着一种直接敌对性。这种直接敌对性就是造成物質生产的发展对于艺术的不平衡的关系底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包括更多的复杂的社会条件）。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就根本改变了。首先，这种敌对性完全不存在了。因此生产发展的結果必然将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而文学艺术的繁荣又将使它本身更好地为其經济基础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与經济基础是相适应地发展的；艺术的繁荣与生产的发展也是互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与經济基础之間，固然也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只是属于人民內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方法，不断地克服这些矛盾。我們提出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任务，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經济与文化之間取得相适应的发展，求得它們之間的平衡。

这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现实的形势。1956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改变了

社会的生产关系，因而使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同时，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样，就有去年以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基本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更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这就是在我国新形势下经济与文化相适应地发展的具体情况。所谓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必然将出现一个文化的高潮，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具有它的社会物质基础，并且也具有它自身的条件。去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就是替今年的大跃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但狠狠地打垮了文艺界长期存在着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提高了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情，并且也进一步解决了作家、艺术家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去年年底以来，大批作家、艺术家长期下厂下乡，可以说是这场斗争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正是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才大大地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干劲，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紧密团结，出现了文艺战线上蓬蓬勃勃的气象。这也可以说是文艺战线上生产力的大解放。作家、艺术家与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以及他们那种一往直前的革命干劲，将是决定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一个基本关键。

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你愿意做促进派还是做促退派？做革新派还是做保守派？一切书呆子式的怀疑

家、教条的搬弄者，以及具有修正主义、保守主义臭味的人，在这大时代中，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正是农民同志所嘲笑的“摇摇摆摆，象个相公”的人物。他们中间尽管还是有人在嘲笑别人赶浪头，但是赶浪头又怎样呢？社会主义的大浪潮是到来了，如果你不是赶上去，那你就将被这个大浪潮所冲走或淹没。

二

这些日子里，文学艺术各部门都在踊跃地提出其大跃进的目标和计划，作家、艺术家都纷纷提出其自己创作的规划和指标。一个热烈的创作竞赛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振奋人心的新气象。但是也不免有人在担忧这种竞赛、挑战的方法，会不会造成创作上粗制滥造的结果。

我相信，这种担忧是出于好意的，但是，我以为这种担忧可以不必。

所谓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当然不仅仅是作品数量的跃进，同时也是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跃进。我们要求创作上出现更多更好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离开了数量的发展又何从去获得质量的提高呢？历史上任何艺术繁荣时期，总是作品的数量和质相适应地发展的。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好的作品和最坏的作品，大抵是居少数，占大多数的，总是具

有一般水平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沒有那大量的具有一般水平的作品，恐怕也就不会产生出那些伟大的作品。因此，量和質的关系是辯証地发展的，既不是以量胜質，也不是离量求質，而應該是从量的发展中求得質的提高。十个指头不一样齐，这是自然的道理。抓住一个坏指头，来否定其余九个好指头，这是右派分子的办法，可是只要一个最好的指头而不要其余九个指头，也同样是說不通的。粗制濫造的风气應該注意防止，但也决不能要求篇篇都是精心之作。粗糙的作品总是难免的。幼稚而具有生气的嫩苗尤其要保护。問題是在于对創作的正确的鼓励和帮助。如果一味只講宁少毋濫，那恐怕大跃进也就跃不起来了。

写得多，是否就一定質量差，反之，写得少是否就一定質量高呢？我想也未必。杜甫，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訶夫，高尔基，魯迅都是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然而他們的写作态度都是十分严谨的。他們那种勤恳严肃的劳动态度，是應該为我們所学习。所以写得多和写得好，并不互相排斥的。比起那些伟大作家来，我們作家的創作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了做一个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我們不仅要立志写得好，而且也要写得更多。

我們目前文学作品的数量是否很多了呢？据不完全的統計，去年中央和省市一級出版社出版的新的文学創作，有七百多种，印数是一千一百多万本，这个数字和解

放以前或解放初期比起来，当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人民的需要来比，和苏联文学书籍出版的情况来比，那就远远落后了。目前出版社，刊物都在嚷稿荒，剧院在嚷剧本荒，少年儿童在要求作家叔叔们多给他们写东西，工农文学读物，尤其缺少，这说明作品的生产常常是落在群众的需要之后，那末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鼓起干劲，为群众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呢？

当然，只看到数量，只追求指标，而忽略艺术质量的提高，这是错误的。即使在物质生产上，也要求保证质量的发展，何况文学艺术更是一种思想性的工作。艺术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求突破现在的创作水平，要有新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唐代的诗歌可以说浩如烟海，但如果沒有李、杜、白等几个大诗人，究竟也显不出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所谓创作竞赛，决不仅仅是比字数，比篇数，也还要比质量。写二十万字的人，并不一定就比写十万字的人强，多不等于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右派分子抹煞革命文艺的成就，我们要坚决批驳，但是也决不等于我们已经满足于现在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大大迈进一步。

提高质量，决不仅是艺术技巧的问题，更主要是作品内容丰富多采，思想的正确深刻，风格的新颖多样。这就不是坐在书斋里所能做得到的。更主要的是从生活的泉源中去汲取养料，从斗争实践中去提高对于生活的认识，从政治上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思想。创作总先要有

丰富的原料，然后才有艺术的加工。因此繁荣创作，无论从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来说，中心的关节还在于作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为了推动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开展创作竞赛是必要的，但同时还需加强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亲密合作，互相帮助。要把心交给人民，交给党，把文艺通向生活之门大大打开。这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途径，是争取文学艺术大丰收的主要保证。

三

既要写得多，写得好，又要深入生活，加强锻炼。于是就有人感到矛盾了。有人说，为了响应大跃进，完成写作任务，我还是回家来写吧。又有人说，我目前的任务是深入生活、劳动锻炼，写作的事情且待诸来年吧，这种矛盾怎样解决呢？

我们应该承认，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鲁迅就说过：“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便当。”但我想凡是矛盾总是可以解决的，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更应该解决的。首先，我们不是在“生活困乏中”，而是在生活沸腾中。沸腾的生活天天在刺激我们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就迫得我们非一面生活一面写作不可。这是作家一种自觉的要求，而不是什么强迫的任务。

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高尔基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

一七年的革命时期中，正是他写作最多的时期。魯迅在他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他杂文写得最多的时期。馬雅柯夫斯基更是个一面战斗一面写詩的杰出人物。可見創作和斗争、創作和工作的矛盾不但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的。在今天这个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們更應該拿出加倍干劲来解决这种矛盾。我曾問过几位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他們告訴我，除了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和酝酿自己的长篇計劃以外，每年在工作余暇写出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說、特写、散文、杂文等的短小形式作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說生活的激情和作家的責任感也使他们非写不行。这种精神是令人兴奋的。

在机关、团体、学校担任工作的业余作家，也有同样的問題。前几天曲波同志在作协座談会上說：“业”要跃进，“余”也要跃进。这話說得很好。事实上，文学工作的跃进，主要还要靠人数最多的业余作家。业余作家当然都很忙，但只要决心，安排得适当，这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順便要說到一下，据說某些机关团体或学校中，有少数人把业余創作活动看作是“不务正业”，我想这是錯誤的。在业务工作崗位上，首先把业务搞好，这是不成問題。为了創作而不顧业务，或甚至靠写作去追求名利，是應該受批評的，但是利用业余时间認真地进行創作，也應該受鼓励。国务院曾經規定过給予业余作家以創作假期的办法，各机关、团体、学校还是應該按照中央的精神貫徹执行的。

精神生产确实有它一定的特点。例如創作总需要一定時間的酝酿，写作时候也需要适当的条件，尤其写大型作品如此。列宁說过：“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必須保証个人創造性，个人爱好性的广大的空間，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广大的空間。”我們必須注意这些特点，應該了解作家劳动的甘苦，为他們安排适当的創作条件。不注意到这些，也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必須坚决反对那种歪曲列宁的話来片面地強調創作生活的特点，以至于宣传修正主义者的“創作自由”等謬論。因为列宁的原意正是为了反駁那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此外，过去我們中間，还曾經存在过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所謂“下去體驗，上来創作”。好象創作就非得在北京或上海这样大都市里不可。这是把創作和生活截然分开两段的錯誤看法。就象托尔斯泰这样伟大作家，多半時間也还是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創作的，經常和农民保持着联系的。何况我們这个时代的作家呢？

我們必須坚持到生活中去，坚持紅与专統一的原則，必須学会能在生活中进行写作的本領，决不能因为响应大跃进，反而离开了生活。这种傾向必須注意和反对。对于业余作家，也应该要求經常到群众生活中去走馬看花或下馬看花。在这方面作家协会應該予以必要的帮助。

周揚同志在“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中說：“作家

在劳动中、斗争中和工农兵相结合，已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执行这项原则。

四

为了繁荣创作，我们提倡题材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广阔性，同时又特别强调要用短小形式的作品迅速地反映当前的主要斗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譬如说，有人在写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人在写古代的传说，有人在研究莎士比亚或红楼梦，这些工作是否就不重要了呢？当然不能那样说的。没有这些工作，社会主义的文学建设还是不完全的。在大跃进中，文学工作的领域，不是要缩小而是要扩大，文学的内容要更丰富多采，这样才能使我们文学园地上呈现万紫千红、百花怒放景象。例如革命历史题材，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在文学上很好表现出来，在理论研究上，象对鲁迅的研究工作，曾经被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弄得乌烟瘴气，需要重新好好来做。这些工作需要有一部分人来担负。并且应该成为三五年内文学大丰收中重要果实的一部分。

但是从整个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把文学反映当前斗争的任务，放在首先的地位。应该使读者能够从我们作品中及时地、亲切地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是文学必须配合一定革命时期中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忽略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今天中国政治上第一

个根本問題，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設，我們就必須用文学这个武器担負起迅速地反映这个斗争、发揚社会主义的精神、鼓舞人民的創造性和劳动热情的政治任务。由于这样，所以在提倡题材多样性和生活广闊性的同时，又必須強調迅速反映当前劳动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任务。在評論工作上，在研究評論一切作品中間，又必須強調評論当前的作品和批判当前主要的敌对思想的任务。这就是說，在全面发展中，又要有以什么为重点的問題。

从目前創作情况来看，当然大多数作品还是以反映当前现实为主的。但是在知識分子中間，也严重地存在着一种薄今厚古的傾向。不少青年无批判地醉心于古典作品，輕視現代作品；有些研究工作者也一味埋头于宋元明清或希腊羅馬的著作，脱离当前的思想斗争。这是值得注意和糾正的現象。作家、理論家首先总應該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迷恋过去，忘記当前，这决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历史經驗告訴我們，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总会产生出一大批反映这个时代斗争的优秀作品。那末，在我們这个大跃进时代中，尤其要在較短时期內产生出既多又好的这样作品。这类作品有的是需要用較大的形式的，而更大量的則应当用短小的、通俗一些的形式。这样才能做到迅速及时，同时也易于普及。目前短篇小說、独幕剧、散文这类短小形式的作品都太少，因此尤其希望大家来提倡一下。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說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我們不仅要从理論上狠狠地駁倒他們，并且也要从創作实践上狠狠地駁倒他們。这就是說，我們要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們提倡創作上迅速及时反映当前斗争的任务是和提倡作家深入生活的方針相結合的。我們要求作家从生活实践中去写出迅速反映当前的斗争的作品，而不是脫离生活脫离实践，在書齋中按照政策条文去作图解。后一种方法显然是錯誤的，是我們所反对的。因此，在最后讓我再重复一遍：文学艺术工作大跃进的決定性关键 是作家、艺术家在更大規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劳动群众相結合。只有抓住这个关键，才能保証文学艺术工作大跃进的巨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智慧的海洋

迟蓼洲

在生产大跃进中，广大群众表现了移山倒海的革命干劲。有人说这种干劲是值得钦佩的，但这只是拼力气，没有技术创造，不能持久。真的如此吗？请看事实。

河南安阳地区，仅仅找山泉这个问题，群众就创造总结了十二条珍贵经验，新鲜生动，通俗易懂。例如：“山扭头，有大流”，“两山加一嘴，必定有大水”，“青山压砂山，必定有山泉”等等，恐怕是许多地下水文教科書上都找不到的。中国人民，是以富有创造性著称的民族，几千年来，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峰。諸葛亮、吳用等那些传统的智慧的典型，与今天的群众相比，都要相形见绌，更不用说那些以“高级知识分子”自诩的梁上君子們了。又如电气、尼龙等等，是现代化很好的东西，可是要让五亿农民都享受到，需要建设多少水力、火力发电站，办多少装备现代化的工厂，要花多少资金、物力和时间啊。现在群众却从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到处都有的不起眼的东西里，找到了实现生活现代化的途径。粪便，人们见了要掩鼻而过的，现在成了无价之宝，制成沼气，就可以给广大农村带来光明、温暖和动力。稻草，

能釀成美酒，制成布匹，彈成軟和的絮被。僅僅這麼几項小事情，可以為國家節省多少煤炭、木材、汽油、糧食和棉花，可以為工業建設節省多少資金，這筆賬是很難算清的。儘管這些創造發現，貌不驚人，但它們來自群眾，出於生產鬥爭的需要，就格外富有生命力，並且具有極大的群眾性和現實性。這是許多坐在實驗室里、制圖板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許多脫離實際的理論家和幹部所不能想象的。

群眾的這些創造發現，還是一種無形的巨大的精神革命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破除迷信，促進人們的思想大解放，也給我們的哲學家、理論家、文學藝術家們出了一大堆新鮮活潑的題目，迫使他們走出書齋、辦公室、創作室，投身到鬥爭的漩渦中去，進行摸索、研究和創作。

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群眾的勞動和智慧，創造着物質財富，推進着生產大躍進，同時又推動上層建築的變革和精神財富的生產。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4月17日）

談“弄斧”

洪 林

看了最近許多农民发明家創造的改良农具，不禁想起古代的巧匠——魯班，也不禁想起“班門弄斧”這句話。

“班門弄斧”這句話出自梅之渙的詩。梅之渙在“題李白墓”詩中写道：“采石江邊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米來往往一首詩，魯班門前弄大斧。”這是他走到死人面前，心有所畏，自愧不如，而發抒的感慨。

梅之渙的詩是被人忘記了，而“班門弄斧”這句話却流傳下來。當有人要在過去什麼專家大師名流學者之前，略抒己見的時候，便會聽到這樣的語：“別在此地班門弄斧了。”而想發表意見的本人，也確是有些自卑，即或要說什麼，也得拖上個謙虛的尾巴：“我是在這裡弄斧了。”

“班門弄斧”這句話把“班門”抬得很高，使人望而生畏；而對於一些學識不足、技能稍低的人，則是讓他們老實些，別輕舉妄動，不自量力。要他們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在什麼人面前？自己有多大本事？如此這般地三思以後，就連斧頭碰也不敢去碰，別說是去舞弄了。於是，寫文章下不了筆，談理論開不了口，辦事情動不了手。

看來這句成語影響不小。即使在現在，有人到了“班

門”之前，也还是有些縮手縮脚，明明有不同的意見，亦是囁嚅難言，這情形再發展下去，就是不在“班門”之前，也不敢“弄斧”了。

这里且不說那些被認為“班門”者，是否真够得上“班門”。只就“弄斧”一點而論，應該是人人可弄，隨處可弄的。陝西省渭南縣的劉恒杰是農業社的普通社員，他一下子創造了開溝犁等好幾種農具。由於他這樣大膽地弄了斧，人們稱他為今代的“活魯班”。其他如河南的王玉振、廣東的周岳安，以及許多農民發明家，也都沒有上過什麼專門學校，更沒有出洋留學，但他們果敢地拿起了大斧，創造了許多前人所不敢想、不敢試的新農具。他們沒有受那句成語的約束，他們沒有以為：“這樣技術上的大事，得請教那些技術專家，咱干不來。”因而他們倒成為真正的“魯班”。

“班門弄斧”這句話束縛了多少人的思想，使他們自卑，使他們畏縮，使他們失去創造性！如今，我們要讓成語進歷史檔案了。不管在科學技術方面，在理論研究方面，在文學藝術方面，都不妨大膽弄斧，多多弄斧。新的語句應當是：弄斧之中出魯班。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24日）

誰最有才能？

亦 辛

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村青年李始美，成了防治白蚁的专家，被吸收为昆虫学会的会员。另一个农村青年王保京，被聘为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看到这个消息，觉得有点突然，有点惊奇；但是仔细一想，原来也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倒是这“突然”这“惊奇”有点反常。

劳动人民为什么不能当科学家？科学家只能是知识分子么？的确有许多人是这样认识的。剥削阶级不用说，他们从来只把劳动人民当作会说话的牲口。许多知识分子也总认为劳动者低能，只有自己是高材，甚至有些劳动人民自己也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不如知识分子能。其实，这都是旧社会里剥削阶级制造的迷信。

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人专门分析了两百年来机械、电气技术史上四十个重要的发明家。分析的结果，和这种迷信恰恰相反。在这些重要发明家中，就有二十五个人是劳动者出身，基本上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而这二十五个人中却包括象瓦特、弗兰克林、法拉第、爱迪生、斯梯文森等最著名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另外还有

八个人虽然曾經受过学校教育，但都不是机械、电气方面的內行，而是“半路出家”，从外行鑽成內行的。四十一个人中只有七个人受过专门的技术教育，在工厂或研究所工作的；但他們在有发明創造以前，也只是普通的工程师、技术員、助手，并不是什么权威。

这个分析是个有力的証明，它証明了科学技术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更不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禁錮，別人碰也碰不得的。相反，大量的主要的发明家不是什么高級知識分子，而是我們广大的劳动者。

世界是劳动創造的，科学技术更是生产实践的产物，而且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它和生产实践密切联系，不可分离。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創造主要應該是有丰富生产实践經驗的劳动者，而不是脱离生产实践的知識分子。这个道理本来是很明白的，为什么許多人都看倒了呢？这就是受了旧社会統治階級所制造的迷信的影响。旧社会的統治階級除了多方面压抑和摧殘劳动人民的創造才能以外，还制造輿論，說劳动者卑賤、愚蠢、低能；說只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才是高貴、聪明、能干的。其实，真正聪明、能干的倒是被他們称为“卑賤”的劳动者；而他們那些养尊处优的所謂“高貴”者，才真是十足的愚蠢和无能。这在历史上固然已經有許多事实作了証明，近年来，許多地方破除了这种迷信，也出現了許多土专家超过洋博士，土办法解决了大問題的生动事实，李始美和王保京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說劳动者最有发明創造的才能，不只是因为劳动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因为他们有敢想敢作、苦学苦鑽的风格。大发明家爱迪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电机工程理論的奠基人法拉弟是訂書作坊的学徒，他們没有什么高深的學問，而且备受旧社会的卑視和摧殘，但他们有劳动者的英勇頑强刻苦的风格，他就能夠获得大专家大教授所沒有获得的成就。王保京今年还只有二十七岁，但他說：“大学教授能做，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沒有对書本知識的迷信，不被大学教授这头衔所吓倒，而是相信自己，看重自己。我們劳动者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天不怕，地不怕，敢說，敢想，敢为的新风格，有刻苦学习、刻苦劳动、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們当然是最能者！

旧社会对我們种种物質上的压抑和摧殘，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旧社会留下来的精神上的迷信一旦消除，我們相信将有更多的李始美和王保京来进一步証明：劳动者多能。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5月23日）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郑 仁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持着邵学成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青年人，在五十天里创造出十一种新式农具。

据“西游记”，唐僧师徒被阻在八百里火焰山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

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最好？”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那方无火？”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又问：“那方有经？”八戒道：“西方有经。”三藏道：“我只欲望有经处去哩！”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经处无火，诚是进退两难。”……

这场争论，反映出三种不同的态度：本来对“取经”就是三心二意的猪八戒，虽然明知西方有经，但是一见道途艰难，马上就想回头；“随大流”的沙僧，在困难面前犹豫徘徊，不知如何是好；到底还是大唐高僧三藏法师，他一心想要取佛经回，任何险阻都不怕，“只欲望有经处去哩！”

取经，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不过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确的确还有这样三种态度。在邵学成创造有苗钵制作器的过程中，不是有人曾经以冷嘲热讽批过后腿

嗎？不是有人不願同他合作嗎？但是邵學成懂得，自己的研究是為了多快好省，為了集体的利益，一定會得到群众的支持。有了群众撐腰，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他敢於面對巨大的困難，排除促退的“眾議”，堅持正確的方向。這就是邵學成能夠創造的基本原因。

唐僧师徒为了走过火焰山，当时孙悟空費尽許多心机，使出渾身解數，最后还亏得哪吒太子降伏了牛魔王，迫使鉄扇公主交出芭蕉扇，才能暢行无阻。今天，在我們社会主义建設道路上，“火焰山”一座連一座，七十二变的孙行者和三头六臂的哪吒在哪里呢？就在我們劳动人民中間。請看，全国各地涌現出多少土专家、土工程师、土发明家啊。他們是从地里突然冒出来的嗎？不是。劳动人民从来就是最聰明的。但在反动統治下，不仅大大压抑了他們的才智，而且强迫灌輸給他們以自卑感。現在人民解放了思想，打掉了自卑，正象邵學成那样——专家搞的东西，我們也能超过。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其实，哪吒和孙行者是不足以和我們劳动人民相比拟的。哪吒最大的本事是翻江闔海，孙行者最大的成績也不过大闔天宮。現在，我們不是已經在移山造海了嗎？在最近的将来，我們不是也要向天宮发射出自己的人造卫星嗎？

（原載“北京日報”1958年5月31日）

誰最聰明，誰最愚蠢？

林之春

劳动創造一切，而剝削階級却把劳动者創造的一切据为己有。这样就不能不制造迷信，来顛倒黑白。他們占有了劳动者創造的財富，說是上天的主宰，祖上的蔭德，而社会財富的真正的主人，被剝夺得一无所有，却被說成是命中注定，天生的奴隶。他們把劳动創造的科学文化送进庙堂，視為禁脔，反过來說劳动者是最卑賤、愚蠢、低能的，而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則是最高貴、聰明、能干的。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靠这种迷信作护符，騎在劳动者头上。

今天，劳动人民已經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但是，旧社会留下的迷信，仍然“阴魂不散”，附在一些知識分子的身上。在高等学校里，我們还听到这种說法：“科学家是大脑袋、小手，宜于搞理論研究；而工人、农民是小脑袋、大手，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这种迷信真的就千秋万世，不可动摇嗎？当然不是。現在，技术革命的号角响了，这种迷信的末日到了。

听听我們社会主义的新农民王保京的豪語吧：“为什么大学教授能做，农民就不能学会呢？”这位二十七岁的

青年农民，打破了迷信，突过重重难关，接连创造了农业增产的奇迹。只受过一年初中教育的农民李始美，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创造了根治白蚁灾害的方法，解决了古今中外学者专家所不能解决的难题。这不过是千百万劳动者创造奇迹、达到科学高峰的两个例证。工农群众的技术革新，已经是满天星斗、遍地开花。只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就要象原子核爆炸一样，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能够把世界翻一个身。

在共产主义的太阳底下，剥削阶级的“阴魂”没有藏身之所了。为剥削阶级所颠倒了的东西，今天都要翻一个身，回到原来的位置。什么人最高贵、聪明、能干？劳动人民自己答复了这个问题。只有科学家“脑袋大”的说法，该收起来了。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必然一事无成。在劳动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是最卑贱、愚蠢、低能的！

（原载“光明日报”1958年5月25日）

雄心惊得专家叹！

姚文元

资产阶级的学者大多是藐视实践的，他们顽固地不相信没有高深的“理论”的普通的劳动者，能够从实践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创造。其实这类人物自己只要一离开书本，要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立刻神魄皆失，五内无全，暴露出他们的底子其实是空虚而又空虚的。生活正在对这种阻碍新事物产生的旧意识旧人物进行冲击。从实践中生长起来的“土专家”，正以蓬勃的青春力量向科学之宫疾进。五月三日新华社报道的李始美成为防治白蚁专家的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看着这种消息，真令人神往。

李始美只念过一年初中，在上过大学留过洋的资产阶级学者眼中，他大概是属于“不学无术”一类的人。一九五三年开始，他曾多次向干这一行业的商人请教防治白蚁的经验，但“技就是利”，有的教授尚且公然把公开自己的学问教给学生叫做“被他剥削”，唯利是图的生意人，怎么肯把用以捞钱的花术教给别人呢？这条路不通，他并未丧气，自己硬一硬头皮就鑽下去。可是书本上有的只是关于白蚁生活习性的一般知识，在中国的具体的条

件下，如何在房屋建筑、桥梁、船只、电线杆、森林……等各方面做好防治白蚁工作，書本上却是全无答案的。于是李始美就奔走于許多农村城市之間，悉心研究各类地区白蚁生活史，作了許多观察和分析，终于，他胜利了，他从实践中掌握了消灭白蚁的规律，創造性地完成了一批批的防治工作。去冬今春，他领导的新会城防治队突击根治了3100多間受害的房屋，使这三万多人口的城市，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基本上消灭白蚁的奇迹。

是的，正如新华社报道中所說，这是“奇迹”。創造奇迹的并不是大学者，而是“土专家”。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蒲蛰龙叹服地說，李始美的創造有很大的科学意义，可見科学并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做的事。把科学和生产分离，置科学于高閣之上，是剝削社会中产生的特殊現象，这是“忘本”的做法，因为科学正是人类生产斗争——向自然作斗争的經驗的总结与提高。随着人类社会朝共产主义发展，这种分离将要根本改变。改变之道，一是原有的科学家面向实践和生产，一是大批大批新专家和“土专家”的出現。李始美是未来的、許多“土专家”的先鋒队之一，所以我們特別拍手庆賀他的成功。

在旧社会里，李始美即使有所創造，也恐怕立刻会被白蚁商人压死、吃掉，他是沒有出头的机会的。只有工人阶级当家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够給新事物的成长以优越的条件和广大的园地。然而有了条件，并不等于就有了創造，如果李始美因自己只有初中一的文化程度而自

卑，或者因白蚁商人的“刮皮”而自餒，那他的創造也是出不来的。他的成功，还因为他有坚韧的毅力和深入地反复地从事調查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正是值得我們学习的。現在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正在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夺取科学的堡垒，当我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必然会遇到的阻碍时 李始美会作为一个榜样，鼓励我們去战胜这些困难。

农民在大跃进中歌唱道：“唐僧取經不畏难，遇上一关破一关，生产跃进学唐僧，雄心刺得岩石穿！”讓我們来依样套一首吧：“始美苦鑽不畏难，遇上一关破一关，科学跃进学始美，雄心惊得专家叹！”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5月10日）

从工人学哲学想起的

于尚思

“人民日报”6月5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消息：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读了以后，真叫人痛快、高兴；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

许多人在学哲学的时候，开头总要遇到一个拦路虎：“哲学太神秘了”。有些人说，哲学的殿堂是专家的住宅，我们普通人是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在，这个哲学神秘的幕，被上海工人的学习实践揭开了。

一般人感到哲学神秘，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一种哲学叫做唯心论，那确实是神秘的。右派分子章乃器曾说：定息不是剥削，只是不劳而获；又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进步，用不着思想改造了。他“随心所欲”地，把白的说成黑的，把狼说成是羊，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全然不顾实际的情况，目的是要给剥削阶级服务，他所信奉的哲学，就是唯心论。这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当然就很神秘，不可理解了。第二，有些教条主义者，在教人哲学的时候，理论脱离实际，死扣名词，鑽牛角尖，一点不会运用；讲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却不联系当前的工作，也不分析学生的思想，可是他指手划脚，摇头摆尾，“条条”是

“道”，听的人当然就感到莫测高深，玄而又玄，神秘之极了。

上海工人跟那些唯心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受过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学习哲学就从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入手，然后进而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这是一条极好的经验；学哲学要从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入手，而不必经过“第二手”著作去学。这个消息，恩格斯早就透露给我们了。

学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镀金”、好看，而是为了运用，解决生活、思想、工作中的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上海工人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比方，有个生产小组闹不团结，干活没劲，因此生产一直完不成任务，但是，到了今年2月，生产任务却超额完成了一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从哲学上的内因起决定作用的道理，分析出来这主要是工人们经过大跃进形势的教育，人的思想起了变化，小组内互相团结合作，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的缘故。这是多么生动的例子啊。

上海工人学哲学、学哲学的具体事例，告诉了我们：哲学是大家都能够学会的，只要认真的话。而且，成为哲学家也不难。德国制革工人狄慈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哲学，独立地研究了哲学上许多问题，得出了和马克思、恩

格斯的辯証唯物論極相接近的結論。我們現在的工人、干部，比狄慈根的条件好多了，狄慈根能做到的事，我們当然也能够做到。

哲学不神秘，而如果不学哲学，思想就不能彻底解放。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

要多想，多討論！

譚靖謨

陝西的青年農民王保京當了科學研究員。

所有的農民都應該想一想，討論一下。王保京是個農民，為什麼又成了科學研究員？他是一個普通人呢，還是一個不普通的人？他首先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的貧苦農家出身，沒有讀過什麼書，現在只有二十七歲，除了在一個鄉村小鎮的店鋪中，當過幾個月的店員（關中人稱這作相公娃）以外，一直是做莊稼活。但他確實又不普通。他比一般的人更敢想、敢說、敢做。解放前，十几歲的孩子，他敢把黨的傳單帶進國民黨重兵把守的咸陽城裏去散發。到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他把敢想、敢說、敢做的精神，全都投放在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上。哪裏有了新農具，他要設法弄來試用，哪裏有了新品種，他要設法弄來試種。他研究，他創造，他打破陳規，不放过新的東西。因此，他們培育出來了七八種優良品種的小麥、玉米、棉花；正在試種的小麥還有一百多種。因此，他們解決了麥棉一年兩熟的問題。因此，他們全社培養了二十五名具有一定技術知識的社員；一般都學會了各種栽培技術。因此，他們全社的糧食總產量超過了解放前兩倍。因此，他

成了著名的劳动模范，因此他当了科学研究员。

想了，討論了，就会明白：王保京的底子，同我們原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他更敢想、敢说、敢做。只要敢想、敢说、敢做，普通的农民就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员。所有的地方都可能培养出优良品种。所有的社都可能使粮食总产量提高两倍、三倍……。王保京已经做到的，别的人有什么道理做不到呢？

所有立志向科学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都应该想一想，議論一下王保京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是什么？他的研究活动，就是农业生产上的创造性劳动；他的创造性劳动，又都包含有科学研究的因素。因此，他們在产品丰收的同时，也获得了科学研究的成果。这是一条现实的、生动的、活泼的科学研究的道路。那末，那些大喊要攀上科学的高峰，而实际上只是想鑽在象牙之塔里的研究者，对不对？他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训，要不要去同实践結合？在同样的年岁，用了同样的时间，王保京实际上跨在了一般人的前头。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他的方向对，道路走得对？

所有下放到农村去的干部也要想一想，討論一下。王保京身在农村，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成就，当了科学研究员，那么，那些认为在农村只能紅不能专的看法到底对不对？那些抱着“咬牙在农村紅两年，然后回城市里去专”的打算对不对？能不能够和应不应该紅在农村也专在农村等等。

好事千千万，坏事也会有。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启发我們思想的鑰匙。不放过一件好事，也不放过一件坏事。多想和多討論，是一种解放思想的手段，也叫务虛。只有多想多討論，才能帮助我們認明方向，才能帮助我們放开脑子大想，放开口大說，放开手大千。

朴实并不是沉悶，但只务实不务虛，容易走向沉悶。沉悶首先是不够活跃，繼而是迟緩，是停滞，久之也便会沉陷于落后了。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5月28日）

敢想敢做就能出粮食

燕遇明

山东莒南县有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吳鳳来，他专心一意地搞玉米高产，搞了几年，产量总没超过亩产两千斤。今年春天，他听说近村有个庄老头，1951年的时候，在一个几十年前被洪水冲倒的屋框子里，种了四十棵玉米，收了一百三十多斤。他合计一下，庄老头的玉米，亩产已超过了一万斤，就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自己社里做了三样种植方法的万斤玉米试种田。以后县委听说了，就在全县普遍地推行了万斤玉米试种田。

吳鳳来的公式是：实践——知識——实践。他是从屋框子里四十棵玉米得来的知識，又运用到万斤玉米试种田里去的。

誰能說一个普通农民不懂得哲学？他們不单懂得，而且还会运用呢。他热爱破屋框子里发生的新生物，尊重破屋框子里的现实，从这里出发办事情。

可是，有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却不懂得这样做。他們会想：破屋框子里能有什么学问，学问都在我那架寬大的書橱里呢！他們的公式是：書本——書本——書本。

可見“敢想”要有正确的方向。吳鳳来的“敢想”，是

紧紧地抓住现实，承認已經发生的事实。其实庄老头的屋框子也是一种試驗田，那是在1951年开始做的，直到1958年才由吳鳳来热心地去合作，进行了研究，做出了措施計劃，加以試种推广。有些人，他們也“敢想”，但那不是从破屋框子里的四十棵玉米出发。有一个农学家，計劃一年写十本書，据說已經完成了两本，一本大概是抄自学生的論文，另一本是从农业部門的材料中抄集的。这种人物的实验田就是他們的書櫥，而他們的收获不是粮食，却是吓唬人的空洞的論文。他們自以为热心地尊重了書本，提高了書本，实际上是把書本降低了，浪費了，或者更确切的說，是把書本埋沒了。

吳鳳来的“敢想”是建筑在“願意想”的基础上。他在未知道四十棵玉米之前，就天天搗古高产，高产做不成，他就出去跑跑，在路上一眼能看三、四里，看看哪里有好办法。当他知道了四十棵玉米之后，就全力鑽研，猛想猛干，睡觉的时候，嘴里也咕咕囁囁，夢見人家抱着热水瓶一样大的玉米来找他。这种如获至宝的社会主义热情，帮他冲破了有些人的七嘴八舌和泼冷水。他說：庄老头能种出来的咱就能种出来！

因为他願意想，就想得多，想得深，想得細，想得全。他是苦学派，睜大眼睛到处寻，到处找。他和那些冷冷清清的学院派大不相同，那些人是閉着眼睛脫离紅尘，見了新事物就摇头或冷笑的，因为在他們寬大美觀的書櫥里，哪能找到这些“凡世的俗物”呢！

是否能达到万斤不敢說，但在破屋框子里是达到了的，这有村干部和周围的群众作証。承認新的事实就是一个大胜利，而取得这胜利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一颗敢想敢做的心，这样一颗高尚的心，直接培育了千千万万人的共产主义风格。

各地試驗田的高产，已經充分說明，只要敢想敢做就能出粮食。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7月10日）

同帝国主义較量！

聞 山

“人民日报”今年5月29日第三版上，用大字标题登了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同志的一篇文章：“我們要在化学工业上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較量較量”。这个标题和文章的内容，使人精神奋发，长自己志气，灭对手威风，真是大跃进的中国人民的豪迈声气。

文章里說，我国的鋼鉄和煤炭，肯定能够在較短的时间內赶上一切資本主义国家，而且，就是在化学工业方面，也不是全都要和他們較量，因为在化学肥料方面，到1962年，也有可能超过美国。我們挑选的比武場在哪里呢？是在有机合成工业（塑料等）和基本化学工业（无机盐等）方面。这是我們整个經濟战綫中最薄弱的一个战綫，我們的塑料工业还是个空白点。而美国却是目前世界上有机合成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各种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纖維，生产量已达三百多万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說，我們是拿自己最弱的和人家最强的較量；我們要比的不是对方的小伙計，而是头号帝国主义。

英雄好汉打擂台，要挑最恶的打。这是中国人民传

統的气概。

說較量，是看得起他們。但要說清楚，在許多地方，帝國主義根本不配和我們較量。發瘡疾的資本主義經濟；腐爛發臭的資本主義政治；低級下流的資產階級“文學”；猩猩和驢子的“超現實主義”……這些東西和我們談什麼較量？我們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日益提高的國民道德——一位印度友人稱之為“精神與靈魂的潔淨”——還有“四無國”的前景……除非一身脏污的資產階級通通死絕，這一切在他們的國度里就不能存在，也沒有可以較量的。至於在戰場上，美帝國主義率領着那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糞羅，早就在朝鮮和我們較量過，這筆賬杜魯門和杜勒斯都記得很清楚，就用不着再說了。

但是，話說回來，帝國主義和他的伙伴們還是有其可以自慰之處；在某些領域里，他們注定了要永遠走在“最前面”，我們真是“望塵莫及”的。例如貪污、凶殺、奸淫、盜竊的案件，寄生蟲、娼妓、失業者的數目等等，在我們，這些將要成為空白點，或者已經是空白點，我們永遠不會和他們競賽。

這都是事實。我們是謙虛的，絕不口出妄語。但是帝國主義分子們听了，却不見得會服氣。前幾個月，剛聽說我們的“英雄”金筆要趕上“派克”，不是有一個資產階級的記者就受不了了，居然去質問我們的工人“你們憑什麼趕派克”么！可是，我們不但要趕派克，緊跟着，“長江”牌手風琴就提出，要在一年內趕上意大利名牌“索勃拉尼”；

上海正泰橡胶厂的輪胎，要赶“邓祿普”；“永久”牌、“飞鴿”牌自行車，正在赶上甚至超过英国著名“鳳头”牌；“北京”、“舵鳥”、“紅岩”墨水已經超过或正在赶上派克“五一”、“二一”。光是上海，就已經有二十多种产品（包括磨床）压倒了英国名牌貨。这些現在看来已經是“小意思”了，但如果回到十几年前連电灯泡都做不了的国民党統治年代，这一切就都是梦想！

現在，从重工业到輕工业，从鋼鉄到墨水，在一切需要赶上并且压倒帝国主义的地方，我們都要和他們較量較量，我們决不假謙虛！

“你們憑什么？”問得真好！

我們，憑共产党的領導，憑六亿人口这个“决定的因素”；憑“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憑“广大群众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憑“从来也沒有看見人民群众象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憑“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現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如果还嫌不够的話，还可以加一句——憑“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憑这些，所以几个月之內，在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会有一百多种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忽然从四方八面涌将出来；会在这几千年“以农立国”的原野里，象春笋一样，长出了一批批的煉鉄爐。就是憑这些，所以在江西定南县只有十戶人家的枫树崗村，农民自己

根据图样和一本“电工简易手册”，就安装了水轮机和发电机，“三八”节时电灯亮了。如果你到福建永春县，你就到处可以看到“1958年实现农村初步电气化！”的标语，发现农民的門联已经把有关合作化的字眼改成了有关电气化的字眼。星星之火，即将燎原，全国电气化为期不远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看到这些山村，原野里的夜明珠，誰能不滿意欢喜，对未来充满信心！

几十年前，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第一，曾在他那本著名的“德皇統一世界策”中預言，中国是一头“睡獅”；現在，英国的报纸又管新中国叫做“东方的巨龙”；說是这条“巨龙”已經跟在衰老的大英帝国背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放心，而且想象得非常可怕，可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們的心目中，在我們的同志和朋友的心目中，中国，却是多么美丽！正象聶魯达說的：“从海洋到海洋，从平原到雪山，世界各民族一起望着你，啊，中国！他們說：‘我們当中出現了一个多么坚强的兄弟啊！’”保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日夫科夫同志6月2日在保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說：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再过十年到十五年以后，当苏联在最重要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計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时候，当中国在工业生产方面把英国抛在后面的时候，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的时候，那时的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

是啊，那时的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我們伟大的祖

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尽管帝国主义分子如杜勒斯之流死和我們作对，“願意带着花崗岩头脑去見上帝”，那又有什么关系！亿万人朝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揚起的尘土，就能盖过这一小撮帝国主义頑固派的破墓孤坟。讓我們的天才詩人們揮起如椽巨笔，加速描繪我們共产主义世界“最新最美的画图”！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13日）

謙遜是對於真理的尊重

何 明

謙遜是美德。然而，“謙遜在哪里結束，不謙遜又从哪里開始呢？”一個人到處打躬作揖，叫不叫謙遜？對這種人，我們常常說他“太謙了”；這里也包含有不以為然的意思。可是在許多人頭腦里卻總有這麼一個糊塗、籠統的觀念：我不行，你行；我們不行，他們行——這就是“謙遜”。不！這不是謙遜。這常常是虛偽，或者是自卑。

共產黨要改造全世界；我們說：社會主義陣營行，帝國主義不行——這是不謙遜嗎？不！這是真理。資產階級學者行，我們打游擊出身的人不行——這是謙遜嗎？不！這是對真理的屈辱。究竟什麼是謙遜？謙遜是對於真理的尊重。對於個人說來也是如此。集體力量、人民群眾的力量是偉大無比的，而個人是渺小的。吹牛誇大，自吹自己行，這是傲慢。然而，當自己被真理掌握的時候，卻必須“當仁不讓”；否則，也就屈辱了真理。

尊重真理，打擊謬論，這才是嚴肅的謙遜。香者說它香，臭者說它臭，這是真實，也是謙遜。如果對臭氣，也要“謙”一下，讓一番，“你香，我們不香”，這叫作低級庸俗。低級庸俗者是不要真理的。

馬克思說得好：“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這就是對它採取嚴肅的態度；對不謙遜仍在採取謙遜的態度，這也就是精神的最嚴肅的不謙遜。”我看，應該把這條真理運用到思想改造中去，從精神狀態上“興無天資”。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4日）

是鋼不是沙

伊 默

沙和鋼，这本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就从它們的可以比較的屬性来看，也是完全对立的兩极。鋼，是密度極高又堅又韌的金屬，而沙則是用水都不能把它粘在一起的東西。但是，有時候兩種完全不同屬性的事物，在一些人的頭腦里，却也混淆不清。

例如過去一些“好心”的讀書人，在國家處於外被侵略，內受壓迫的時期，總是慨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如魯迅所說：“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他們忘記了，即使是沙，也“是統治者治成功的”，更何況自古以來，小民就不是沙，有過多次的民變，造反，團結起來共同給予當時的反動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

人民是鋼不是沙，這是歷史的真實。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正因為對於人民群眾有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信心，才能在即使表面看來是革命低潮的1930年，洞察到了革命高潮的即將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

而現在，当六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他們的鋼鐵意志建立起新的祖国，并且已經取得巨大建設成績的今天，却还有些“古久”先生，在我們面前翻着“陈年流水賬”，对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散播着缺乏信心的論調。这些古久先生中間，有的人只看到了我們国家的一穷二白，他們害怕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只要工作中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他們就大呼小叫，丧失信心；有的人在全民性的大跃进的海洋里，是只看到了工作中的一些消极黑点，他們虽然不叫喊，却怀着恐惧的心情默默地等待和观望，因此，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这些古久先生不願意相信，这穷和白的国家，能够象巨龙一样的星飞电掣地跃进；更不敢相信，几世紀以来一直是穷和白的落后国家，能在短時間內赶上和超过那生产力相当发达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他們沒有看到，在这穷和白的后面，还站着可以翻轉乾坤的强大的六亿人民。穷的根子培养了他們鋼鐵般的无敌不摧的革命意志，白的大地鼓舞了他們更有气吞山河的勇气，画出最美丽的画幅。仅仅举出几个数字吧：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全国扩大了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解放后八年內增加的灌溉面积总和还多八千万亩，比解放前几千年間所达到的灌溉面积还多一亿一千万亩。在同一时期，全国农民积肥三千一百亿担，平均每亩可施肥一万八千多斤，按肥效計算比积肥成績很好的1956年还多两倍以

上。从今年1月到4月，全国造林二亿九千万余亩，等于过去八年造林总面积的一倍半。

无端的自卑感和妄自菲薄，是侏儒的感情；决不是大跃进中人民的感情。这些翻着陈年流水账的古久先生，象过去的“一盘散沙論”者一样，他們只看到了历史的一面，沒有看到，有了革命觉悟的人民，是一切决定性的关键。革命的人民可以改变历史，也可以創造惊人的奇迹。如果死抱着历史，看不見活人，那么，他就只能跟着他的历史一起被拋到垃圾箱里去。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

粗中有細

郑 仁

张飞，在人們心目中，只有匹夫之勇，是个粗人莽汉。其实，細讀三国演义，結論并非如此。

当日，諸葛亮統兵进川增援刘备，与张飞分兵两路，約定“先到者为头功”。諸葛亮由水路泝江而上，沿途毫无阻拦；张飞在陆路进軍，一路上，山路险阻，关隘重重。按常理来說，“头功”應該是諸葛亮穩得的了。但事出意外，张飞智取巴郡、义释严顏以后，一路四十五处关隘聞风而降，不費张弓只箭，就长驅大进，先到了目的地。連善用計謀的諸葛亮也大吃一惊，不得不贊叹：“张將軍能用謀！”

这样有勇有謀的事例，在张飞身上并不少見。象大鬧长坂坡，智取瓦口关等等都是。由此可見，张飞的确是个“粗中有細”的人物。

“粗中有細”，正值得我們学习。

什么是“粗”？对我們劳动人民来說，就是革命的气概，就是勇气和胆略，就是“战略上藐視困难”。今天，在中国人民面前，高山正在低头，河水正在讓路。人們的思想从迷信、自卑等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正在設想前人所不

敢設想的事情，正在創造前人所未有見過的奇蹟。這種沖天的干劲，敢想敢說敢干的風格，正是全面大躍進的源泉。

什麼是“細”？這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智慧和措施，就是“在戰術上重視困難”。我們懂得，前進的道路是寬廣而不平坦的，新矛盾新問題新困難將接連不斷地產生；只有善於分析矛盾、發現問題、克服困難，我們才能一往直前，長驅直進。這種深入細致，踏踏實實的态度，正是我們能夠實現躍進指標、創造驚人奇蹟的保證。

“細而不粗”，沒有革命的气概，就鼓不起干劲，爭不到上游，一遇困難就臨陣退縮，猶豫動搖，这样的人只能當躍進的逃兵。

“粗而不細”，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理想就會變成空想，干劲就會變成盲動。这样的人也有成為吹牛皮、說大話的“清談家”的危險。

“粗中有細”，把革命的气概和求實的精神結合起來，既要大胆設想，又要實干苦干，既要大干特干，又要深鑽細鑽。這樣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勝利向前。

（原載“北京日報”1958年6月5日）

科学的标准

公 羊

判断一件事情科学不科学的标准，不是抽象的原理，而是实践的效果。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惜还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

以生产企业的劳动組織为例，单从抽象的原理上講：专业分工似乎总要比一揽子包干“科学”吧！可是，市汽車修配厂却在这个上头摔了个跟斗，走了将近两年的弯路。事情是这样：

起初这个厂采取的是一輛車由一个組“包干”修理的办法，后来听说外地一个先进的兄弟厂实行了专业分工，流水作业，汽車进厂之后，从拆車，修理，一直到装車、試車，每道工序都有專門的工段和小组来負責。他們一听，很快地認定，这样的劳动組織既然合乎科学，好处必定很多：效率高，質量好，工人提高技术快。殊不知，施行之后，滿不是那么一回事！停工窝工，零件丢失损坏，質量返工等等，問題层出不穷，連續八个月完不成任务。这时候，他們仍旧不敢怀疑，本厂应不应该实行专业分工、流水作业的办法。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最近在双反运动中，解脫了捆住思想的繩子，才决定把包干制的优点撿回来。

在一个組基本上恢复包干制，作为試点，效果很好：汽車大修的在厂日数由平均五十一天，縮短到二十七天，工时比以前省了百分之十，質量提高，成本降低。

当然，我們不是一笔抹煞专业分工，也不是盲目反对流水作业。一般地說，这是先进的劳动組織。問題是各厂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条件。在那个外地的兄弟厂，修理的車型号比較单一，車源比較固定，施行专业分工、流水作业确实能够大大地提高生产。至于市汽車修配厂，修理的車厂牌和型号多至三四十种，車源又是时多时少，很不固定，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就不宜采用专业分工。举例說吧，因为車种多，配件不可能全都預先准备好，于是“流水”就时常中断，如果是“包干”还可以作作别的活，而专业分工之后就只好坐在那里傻等。又例如：由于这个車和那个車，构造很不相同，要不是經手拆的人去装，有时連装都装不上。

学习先进經驗，必須結合本单位的具体条件。这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可是，汽車修配厂的有些同志为什么忽視了这一点呢？如果說开始时是由于缺乏經驗，那末在摔了跟斗以后，为什么还不敢怀疑呢？原来他們上了教条主义的当，被“科学”两个字唬住了。他們以为：在原理上听起来很“科学”的东西，实践中也一定很科学；对別人“科学”的东西，对自己也一定很科学。于是，便把書本上的原理，別人的經驗，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在双反运动中，他們才恍然醒悟过来。

这段迂迴曲折的过程，給了我們一个深刻的啓示：科学，并不是什么抽象、神秘、固定不变的东西。符合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的东西，实行之后能够获得“多快好省”的效果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反之，就称不上什么“科学”。

“一切都依時間、地点、条件为轉移”、“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只有懂得这一个道理，牢牢記住这个道理，我們才能从教条主义、經驗主义的羈絆中彻底解放出来，贏得思想上的自由。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5月17日）

談“条件”

越 清

昨天本报登載了一篇通訊，題目是“被解放了的思想”。文中說到，石景山鋼鐵廠不少干部和技術人員檢查了技術領導思想上的絆腳石——“唯条件論”思想。它片面地強調客觀条件，在訂計劃的時候，握死數，看不到人這個活的因素。其實，有這種“唯条件論”思想的，豈只是石景山鋼鐵廠的干部？這的確是太熟悉的事了。常常在訂計劃的會議桌上，我們更多地聽到的是死握數字、談客觀条件的束縛，比較少（甚至很少）聽到的是人的因素——群眾的高漲的生產積極性。這樣，計劃怎麼能够不保守呢？眼界怎麼能够開闊呢？思想怎麼能够解放呢？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是不問具體情況的主觀主義者，而是講求“条件”的。在複雜的經濟活動中，握數字也是需要的。然而，“条件”怎麼講法？數字怎麼握法？却是方法大有不同。一種方法是借“客觀条件”“握數字”之名來束縛活的人，“只見物不見人”，把“条件”和“數字”看成死的，不可更易的；把那些明明經過努力可能做到的事，都高高擱起，認為是“蛤蟆想吃天鵝肉”辦不到。這就是“唯

条件論”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用活的人的积极因素来促进客观条件更有利地发展,适时地修改“数字”,使得数字里充滿着人底活泼泼的生命力量。讓条件(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不断地变化着,讓数字为活的人服务。我們贊成的是后一种;因为这是正确的方法,这样做更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設。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4月15日)

共产主义者的時間觀念

一 丁

感謝一位讀者，他給我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要愛惜時間。這位讀者在列舉了許多浪費時間的事例之後，意味深長地說：“我看到這種情況，非常心焦！在我們這個時代，哪怕是一分鐘的時間，也可以做出豐功偉績來，然而，有許多寶貴的時間就這樣地被那些不自覺的人們浪費了。”我以為，這位讀者的“心焦”，表現了他對於生活的熱愛，表現了他的共產主義的覺悟。

如果說，資本主義者最寶貴的是金錢的話，那末，共產主義者最寶貴的是時間。時間，這個稍縱即逝的東西，對於任何人都是無情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的一切，都在發生着急遽的變化，舊的東西在死亡，新的東西在生長，這是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最根本的規律，共產主義者喜歡這種變化，並且一直為促進這種變化而努力，歷史給共產主義者提出了一個任務，這就是要和時間賽跑，要走在時間的前面！要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是爭取時間；要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這是爭取時間；十年決於三年，三年看頭年，這是爭取時間。目前已經出現的工業、農業生產大躍進，這就是六億人口

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时间的胜利。时间，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多么宝贵的东西啊！

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时间，与其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如說是缺乏共产主义觉悟的一种表现。迟上班，早下班，是浪费时间；仅仅是按时上班下班，而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浪费时间；仅仅是从早到晚，忙乱不堪，而没有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也是浪费时间。……所有这些浪费时间的现象，和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极不相称的。

有些人常常慨叹着“时乎时乎不再来”，然而，他们却不抓紧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可怕的规律，这就是，对过去，老是忏悔，忏悔，对将来，老是幻想，幻想，而对于现在，对于正在进行的时间，却老是让它轻轻地滑过去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注定了这种人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充满了童话般的奇迹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在感染着我们，在推动着我们。六亿人口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愉快的、创造性的劳动，祖国的面貌正在急速的改变，共产主义的幸福远景，有力地吸引着我们的人民。夏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我们的前人已经深知时间的可贵，难道我们共产主义者不应当更加爱惜时间吗？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热爱生活，应当爱惜时间，而不应当浪费时间。怎样才算爱惜时间呢？不只是遵守时间，而且要抓紧时间；不只是抓紧时间，而且要争取时间，要善于合理地安排时间，充分地利用时间。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倡的要和时间赛跑，要走在时间的前面。

爱惜时间吧，一切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跟着时间一同前进吧，一切共产主义的战士。时间将以极其严峻的态度考验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希望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能经得起这种考验。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23日）

从“冷冷清清”談起

振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气氛。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但表达着作者的情感，也反映着她的时代的风格与气氛，具体地说，就是一切都没有希望，一切都没有办法。这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们这是热火朝天，力争上游，气象万千的时代，豪迈的气概真是无可伦比，可以说是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有办法。

李清照为什么会写出“冷冷清清”的气氛，这是与她的时代和她的身世分不开的。据张端义“贵耳集”说，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李清照自己在“金石录后序”里记她的身世遭逢，是极其悲惨的。北宋末年，她的家乡济南淪陷了，她和丈夫赵明诚一生所积蓄有十多间屋子书籍、字画、古器物，都被烧毁了。她和丈夫逃往南方，丈夫到当时南宋的京城南京去，害了沉重的瘧疾和痢疾，等她赶去看他，他就死了。在这一連串沉重的打击下，她也病得非常厉害，碰上南京又要逃难。她又东奔西走，輾轉避难，随身携带的书籍、器物又大批散失了。她晚年就处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地，“声声慢”就表现出这样的心情。

就是在这种心情里，她还是不忘恢复失地的。“空梦长安，認取长安道”（“蝶恋花”），梦里还在想望故都的收复。可是当时南宋小朝廷走的是向敌人屈膝投降的路，所以终于成为“空梦”。恢复的梦空了，故乡淪陷了，家业完了，丈夫死了，她当时心情的悲苦凄惨是可以想見的。那末所謂“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真实地表现了她的悲苦心情，这也是南宋小朝廷沒落的景象在她感情上的反映。“寻寻觅觅”，她是有所追求的。追求什么呢？这里可能有“認取长安道”的恢复失地的梦想；可能有过去盛时的回想，所謂“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拈金雪柳，簇帶爭濟楚”（“永遇乐”）；也可能有对丈夫的怀念，“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个人堪寄”（“御街行”）。一切好梦都无法追寻了，那末感到冷冷凄惨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詞，我們更会感到我們的幸福。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建設着社会主义，乘风破浪，势如破竹，一日千里。这才是我們这个时代的风格与气氛，也才应该是我們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是縱橫睥睨，而是束手无策、“冷冷清清”，那就是时代性的錯誤了。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4月17日）

数字的诗

芷 汀

一位苏联作家在他的小说里写道：“我们这个时代你用什么韵脚也表达不出来！……这是用数字写诗的时代，是用比例尺写诗的时代。”

对呀，这话简直说到我们心里来了。尤其是最近，我国六亿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高潮的时候，报纸上每一条消息，都象优美的诗篇一样，吸引着、激动着我们。而这些消息，多半是报道了计算精确的增产数字、节约数字、跃进数字……，谁还感到这些数字是枯燥无味呢？它们是用千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诗篇！

这里，我不预备举出报纸上发表过的事例，只拿我们工厂里最近在大会小会上都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数字来谈谈。这个数字小的很，是小数点以下的一个数目，但它吸引了和集中了全厂职工的注意力。大家琢磨它，计算它，想尽一切办法改变它的一个字码儿。你们说，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拣芝麻粒儿吗？——不！告诉你，讨论的结果，变动了几次字码儿，计算一下，今年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增产一座6,000 瓩的水力发电站。这还是芝麻？多

大的“西瓜”呀！

老实說，从前我对数目字就不大感兴趣；自从一九五四年，来工厂工作了一个时期，神秘的数字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来。一天，我跟着党总支委員張利民同志一块到現場去。無論走到那个車間，他总是先觀察一下日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然后再看工人操作的情况。我从那些数字上看不出任何名堂来，而張利民同志却那样聚精会神地观察它們，他时而皺眉，时而微笑。离开現場以后，他告訴我：“从表报上看起来，九点鐘的时候，一定是厂长或者总支書記到現場巡視过了。你看出那些数字来嗎……”以下說的是些“通风量”“灰中可燃物”“二氧化碳”等我完全不懂的名詞。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我从表报上看到的是0.575 和0.583……象一些芝麻粒大的数目字，張利民同志却透过它們看到工厂負責同志什么时候到过現場以及能觀察出工人的思想活动。

工会主席告訴我：“張利民是发电厂的一位巨人！几年来，人們把煤耗和張利民的名字連在一起，就象两个巨人摔交一样，今年煤耗把他摔倒了，明天他又把煤耗摔倒。但摔来摔去，煤耗总是年年下降。要知道，降低小数点零几就代表着給国家节约不可估量的財富呀！”

有这样一些过程，我对数目字渐渐感到兴趣了。我了解了我們发电厂从解放到現在降低煤耗的情况：解放时发一度电耗煤量是一公斤多。由于职工的思想觉悟和发电技术的提高，煤耗很快地降低了。在抗美援朝期間，

为了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全厂职工連家屬在內都发动起来；职工子女小学的孩子們到厂里来慰劳、宣传、唱着这样的歌：

叔叔大爷齐努力，

煤耗降到零点七。

党委提出号召，为0.78而努力。以后試烧低值煤，又使煤耗大大降低了。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张利民等同志組織的技术研究組，使得电厂里这项主要指标年年有所改进。

不过，煤耗降到一定程度，再前进就不太容易了。所以最近两年来，每年只能使煤耗降低一克（即降低0.001到0.002），比如，一九五六年煤耗完成0.575，去年完0.574。今年开始訂计划时，国家要我厂先討論个譜兒。按一般道理說，按常規講，人員和机器設備沒有变动，计划也应该按照去年訂出来。努努力也不过降低一克罢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人走路一样，还能一下子迈三步、五步嗎？可是，一九五八年和从前任何一年都不同了！一辯論，降低15克（等于往年的十五倍）。不，又辯論了几次，便又大跃进了几步，結果比去年降低了34克！

这是多么惊人的大跃进！关于跃进的根据，如改进燃烧技术等，这里不談。只說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就是自从去年整风以来，工厂里张利民式的巨人，忽然大大增多起来，和煤耗摔交，一下子把煤耗摔出十八丈远去。因而，在我們厂（不算太大的）一个跃进，就比去年增产出

5,600,000元来;也就是增产出一个发电站来(我們知道一九五七年首都发生的許多新事物当中,有一件事是建立了模式口水电站,这个拥有两台3,000瓩发电机的水电站,建設費才是5,500,000元)。

請算一算細賬吧! 六亿人民都在大跃进! 請讀一讀报刊上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数目字吧! 它們是些多么壯闊、优美、动人的詩篇啊!

1958年3月13日

附記: 昨天写完这篇小文,今晨請党委書記审阅。他說,昨天討論煤耗,又降低了七克。就是說,和去年比,不是跃进34步,而是跃进了41步。特此更正。

3,14崧。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永无止境

黎少岑

近来从报纸上看到，小麦試驗田的亩产量和武汉各紗厂試紡細紗的支数，几乎每天都是在刷新紀錄；这使人兴奋又引人深思：是不是已經到了頂呢？是不是可能还出現更高的紀錄呢？

在小麦剛出現亩产 3215 斤的紀錄时，还有人不肯相信；但每天翻开报纸，却会发现一个比一个更高的数字。在出現 3530 斤和 3786 斤的数字之后，接着便突破四千斤的大关，連續出現 4353、4535、4689 斤等数字，而現在是已經又突破五千斤的大关了。这还不算，孝感朋兴乡的劳动模范官木生，竟說要在明年創造亩产万斤的紀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既然在一向貧瘠的山区和旱地都有可能亩产四五千斤，在一向是比較肥沃的江汉平原又怎么能不出現亩产万斤呢？这就是說，尽管試驗田的亩产量比一般产量超出好几倍，都还並沒有到頂。

武汉各紗厂开始紡細紗，紡出了六十支的細紗都要算新聞，随后在十三天內連續由八十支、一百支、一百二十支增加到一百四十支，就有人以为已是到了頂了；但接着到第二天便由一百四十支跳到一百九十支，第三天又

由一百九十支跳到二百三十支；最近又二百五十支、二百八十支，以至徑向三百支前進了。武漢各紗廠都缺乏紡出細紗的設備，有些連機器都是陳旧的；武漢地方所用的棉花不是好棉花，往日還是拿這當作趕不上青島、天津等地的紗廠的理由的；既然在缺乏機器設備的情況下用不夠好的棉花都能紡出二百八十支的細紗，又誰能担保在更好的情況下不能紡出更細的紗呢。

最近又出現了早稻的紀錄：開始在福建海澄縣黎明社出現畝產 1875 斤的紀錄，接着江西貴溪縣花山社便又以畝產 2340 斤的紀錄遠遠地超過了它；這還只是個開始哩！

資產階級學者曾給某些生產規定出不可能再高的極限，這些極限已經或正在給我們打破，並把它遠遠地丟在後面了。但突破了舊的定額並不等於完全突破了舊的思想上的限制；正如承認小麥的畝產量可能提高到幾千斤，也並不等於承認小麥畝產量的增加是無有止境的。舊的局限是打破了；是不是會產生發展已是到頂的思想，又用新的局限來限制我們的發展呢？不能不是一個問題。

有人說，生產發展總會有個止境的，田畝總只有那樣大，再密植些也終歸是有限的。但是，小麥增加的因素多得很，甚切有許多現在還沒有被我們充分認識。例如現在就已發現出可以刺激植物生長的化學物質，它可能使植物成熟的更早、果實長的更肥大；假如將來有朝一日能

用上这样的“肥料”，产量不是又会成倍地增加么？不用說，还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增产条件，可能使小麦更大大地提高单位产量，增产是永远也不会到頂的。

小麦是如此，其他生产何尝不是如此？增产的前提，是思想要彻底解放，也就是要彻底粉碎一切这样認為可以“到此为止”的限制。生产的发展是无有止境的，跃进再跃进是可能的；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們前进。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7月4日）

到处插紅旗!

梁汝怀

党中央决定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实际相结合的刊物，定名为“紅旗”。

这真是个好名字，它代表着我們党的伟大的风格。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以插紅旗作为自己的光荣的职責的。馬克思在他年青的时候，就大胆攻击那些腐朽的反动派，喊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一个萌芽，然而馬克思和他的战友們敢想敢說敢做，敢于在被各色各样資产階級思想占領的思想陣地上插上第一面紅旗。

紅旗，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战斗的号召。一面光輝夺目的紅旗，能使千万人精神焕发，奋勇向前，能使跌倒的人又重新站起来，怯懦的人变为坚强。在战斗中，一面紅旗穿过硝烟插上制高点，就能号召战士們再接再厉，去夺取敌人的最后陣地。

我們在思想战綫上和政治战綫上的革命，就是插紅旗的斗争。我們不去插紅旗，別人就去插白旗，插黃旗，插灰旗，或者插黑旗。反正任何思想陣地上都得有一面旗帜。大而至于一个陣地，一个思想領域，小而至一个人

的头脑，都是如此。

在插旗的斗争中，馬克思主义已經深入人心，占領了很大的陣地，东风送着紅旗，吹遍世界各地，它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成为亿万人追求和向往的目标。

但是，斗争並沒有結束，我們的敌人并不甘心退出思想陣地，正如它們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样，它还想千方百計地重整旗鼓。我們的思想陣地时时刻刻都有受到侵袭的可能。帝国主义在它的垂死掙扎中，也想收买些婁罗打起冒牌的紅旗（例如現代修正主义）去迷惑人。我們还要去插上更多的紅旗！

我們贊美歌頌一切敢于插紅旗、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陣、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依靠这样的人，我們才能够領導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我們反对那种偃旗息鼓、萎萎縮縮、妄自菲薄的人。

有一种人，前怕狼，后怕虎。他們的格言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他們想来，能插紅旗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插錯了怎么办？他們自己就不願担負这个責任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稳重”的外衣下掩盖着个人主义。也就是宁願讓陣地被敌人侵占而不敢发一枪的可耻的逃兵。

也有一种人不敢插紅旗，表示謙虛。“沒有把握，看看再說”。謙虛当然也是好事。可是，天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謙虛！明明是在尖銳的斗争里做个縮着袖管的冷

眼旁觀者，做个局外人，哪里是什么謙虛？

在敢于插紅旗的人們中間，也有一种一勞永逸論者，好象只要哪里一插紅旗，也就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垫高了枕头睡大覺了。这是一种懶汉，不是战士。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可能越变越好，也可能变坏。問題是在这个陣地上的紅旗是不是永不褪色？有的人时刻警惕着保持紅旗的鮮艳，也有的人却相反，經過风吹雨打，就掉了顏色，而自己又不自振作，听之任之，結果就由紅而浅紅，而灰，而黑，結果不知变成什么顏色了。

插紅旗，需要勇气，也需要恒心。讓我們大家都成为勇敢的旗手，在自己的头脑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在我們所接触的一切思想陣地上，插上千千万万面輝煌的、永不褪色的紅旗，讓这些紅旗永远指引着我們前进吧！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5月30日）

破“假洋鬼子”

张春桥

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这件事，发生在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二十五天以后。算来，已經过去了四十六年又半年。那位姓錢的“蓬头散发象个刘海仙”的假洋鬼子，是死了还是活着？无从察考。但是，他并没有断子絕孙，他的后代，不准人們革命的假洋鬼子，仍然活着，却是可以肯定的。只是衣着早已換了样子，“哭丧棒”不大用了。

上海有个音乐学院，里面有个声乐系，系里有个学生，名叫鞠秀芬，民歌唱得很好，群众喜欢听，老师也承認只是外国歌唱不好。据“里通外国”的人說，她唱起外国歌来，“有中国民歌味”，因而也就“无味道”，期考只給三分。請看，这里不就站着一个假洋鬼子嗎？中国人办音乐学院，中国歌唱得好，不給五分，只給三分，这是为什么？“NO！——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如果再問，假洋鬼子就要举起“哭丧棒”来了。

可惜，这种假洋鬼子，不只音乐学院有。死迷信洋人，又拿洋人吓唬中国人，什么不順他的眼，就口口声声“NO！——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这种假洋鬼子在别的

行业里也有。

真是无巧不成书，六月七日“解放日报”的头条新闻说：上海华亨染料厂有一个木工，姓徐名阿桂，同阿Q的名字同音，是一个文盲，作了二十三年的木匠，前年才到这个厂作木工。这个厂有一个“油黑车间”，生产一种叫“油黑”的高级染料，因为用的是“颠复式机筛”，颠复很慢，震动又大，整个车间黑粉弥漫，操作工人个个象黑张飞，身上、脸上都染成黑色，带上两层口罩，吐出来的唾沫还是象墨汁似的。工人弄成黑张飞，生产效率并不高，染料浪费又很大。徐阿桂根据自己的经验，想着革命，按照面粉厂使用的转动式机筛的原理，加以改革。他把这个主意大胆地告诉一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美国依利诺大学的硕士，吃过洋饭，很迷信洋人的，一听说这个文盲要革命，当然是：“NO！——……”给打回去了。但是，徐阿桂比阿Q毕竟不同，他是个工人，又处在“柿油党”下台、共产党当家的时代，在一开头，他对假洋鬼子也有些怕，人家美国留学生都说不行，怎么能行？到了今年，整风运动的烈火照亮了他的眼睛，双反运动开动了他的脑筋，破除对假洋鬼子的迷信，徐阿桂终于在党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革命成功，创造了“跃进式转动机筛”，从根本上解决了粉尘飞扬问题，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并且使产量提高了六倍以上。工程师只好认输：“阿桂师傅压倒我们了。我要好好向工人学习。”这个故事，也就以今天的阿桂胜过了美国留学生而告终。

在这里，我并不是說一切吃过洋飯的人都是假洋鬼子。我只是說那些死迷信洋人，又用洋人来吓唬中国人的一些人，他們自己也是以近乎洋人为荣，越洋气越好的。也許是上海过去是“十里洋場”的原故，洋鬼子的余威未消，假洋鬼子也还能靠“洋气”吃飯。值得說說的是，这种“洋气”也吹昏了一些人，一心一意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跑。有一位演員，最崇拜的就是美国大明星賈萊古柏，平时一举一动，連抽烟的姿势，也要学他。还有一位，看了一部外国片子，“完全沉醉了”，“这一天是最舒服的一天”。又有一位，到农村“體驗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時間蹲在家里打扑克、講故事、玩，最多学习学习农民的动作，看看他們穿的什么衣服，并不想真正同他們打成一片，急等着回家拍戏，回到家里才“大松一口气”。在作家中也有这样的人，談外国名家，祖宗三代如数家珍，談到中国自己的作家，就对不起，一点不知道，更不要說工人农民中間涌現出来的作家了。我想，如果称某人是阿Q，他一定不高兴，但是比較一下，如果說阿Q还敢于“在肚子里暗暗的咒罵”假洋鬼子，还敢于把“文明棍”藐視为“哭丧棒”，我們队伍里的某些人，連这一点也作不到，甚至連想也不敢想，更不要說象徐阿桂那样“压倒”美国留学生了。平时自以为很有本領，在假洋鬼子面前却直不起腰来，风格之低，很难用什么东西来比拟了。

“呵哈，你是国粹主义者嗎？你拒絕学习外国嗎？”且慢，用假洋鬼子喜欢說的那句話來說：“NO！”我們是要学

习外国的，外国的一切好东西我們都要学，在这一点上，我們的热心并不比你們少一分。但是，我們是站着学，不是跪着学。既不是假洋鬼子式地，也不是阿Q式地，而是徐阿桂式地学。徐阿桂是既不把洋人看在眼里，也不把假洋鬼子看在眼里，单单把党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依靠党的支持，打掉了假洋鬼子的威风，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终于創造成功的。

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进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时期，我們的国家現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鋒陷陣、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打掉自卑感，从精神上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紅旗下，为实现这个伟大的革命而斗争吧！任憑假洋鬼子們說一万句“NO！”也阻挡不住我們前进。

不断革命万岁！

6月7日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打击別人，抬高自己”

張春橋

写完“破‘假洋鬼子’”，又想到一种議論。有人說：我們并不是假洋鬼子，但是，你們說上海的工人写了一百万篇文艺創作，好得很，報上大吹特吹，很有点打击別人、抬高自己，其实，照我看，不論照外国标准、还是中国标准，这些东西浅得很，有什么了不起？

這話不假。上海工人在大跃进中，确实写了很多东西，我們也确实認為好得很，大吹特吹了一番。这是不是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也可以这样說。“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不是一句好話。誰如果在集体生活中，发展个人主义，打击別人，抬高自己，那一定要受批評，也应当受批評。因为这种个人主义，发展起来，就要鬧不團結，就要損害集体利益，打击了集体主义，抬高了个人主义。但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条件下，真有那种不打击別人、也不抬高自己的太平局面嗎？在思想战綫上，你不打击資產階級思想，就不能提高无產階級思想；你抬高了无產階級思想，就一定打击了資產階級思想。在无產階級内部，也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錯誤之分，你总要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偏向一方，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工人們写了一百

万篇东西，你是欢迎，还是反对？是热烈地欢迎，还是冷冷地欢迎？是見其“浅”而摇头，还是見其是大树的幼芽而鼓掌？总要表示一个态度，总要决定是抬高它或者打击它。不表示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要說“这些东西浅得很，有什么了不起？”那就需要爭論一番。当然，比起工人阶级已有的和将有的創作的森林来，現在的許多作品还是幼芽，不能說不浅。但是，比起那些看起来很深，但是充滿资产阶级思想毒汁的东西来，不但有前途，而且十分可爱。比起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感情很淡的作品来說，这些作品就深得很。就是“浅”吧，对于革命的“浅”，鲁迅在“回忆刘半农君”这篇文章里，曾經这样鮮明地表示过他的見解：

不錯，半农确是浅。但是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又說：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我們現在面对着的，是超过刘半农不知多少倍的无产阶级战士們，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写作的东西，即使再浅一些吧，但是它們冒着无产阶级战士的热气。这是对中国最为有益的热气，只有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

人們，身上才能发出这种热气。我們当然不满足于“浅”，但也决不自慚形秽，也决不容許別人妄加菲薄。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大吹特吹，确实有“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的意思。

我們可以看看秦兆阳。在他編“人民文学”的时候，你看他对刘宾雁是多么热心？他确实花了精力，滿腔热情地抬高了刘宾雁。我們为什么不从这个反面教員学习到一些东西呢？既然他是那样地热心抬高資產階級右派的作家，为什么我們不該抬高无产階級的作家呢？难道我們也以为自己的作品很“浅”、不值得抬高嗎？难道我們也以为只有資產階級名人、学者才是值得抬高的嗎？

作为讀者，我們看到“人民文学”和其他許多报刊最近时期发表了許多工农兵自己写的东西，非常高兴。我們希望能够坚持地作下去，不要被別人刮来的一股“浅”风吹掉。

当然，抬高自己，并不是要提倡庸俗的捧場。从浅到深，从幼芽到森林，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庸俗的捧場，只会使幼芽夭折腐烂。一切希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兴旺起来的人們，都不願意这样做。“打击別人，抬高自己”，这就是說，在兴无产階級思想、灭資產階級思想的斗争中，要具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敢于热烈地、鮮明地支持新事物，反对旧事物。庸俗捧場，当然是旧事物，当然必須反对。但是，要反对旧事物，就必须抬高新事物，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不能妥协。我們反对迷信洋人、迷信古人、迷

信古洋人、以及反对迷信那些当文化买办的假洋鬼子，也无一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至于說誰是假洋鬼子，誰只是迷信一点洋人，那是容易分的，而且，只要真正地解决了自己的立場問題，站到无产階級立場上来，对无产階級有了真情实感，也就比較容易懂得为什么虽然“浅”也还要“抬高”，虽然“深”也要藐視，因为，那时他已經同我們說的“抬高自己”这个“自己”站在一起了，也就有了衡量深浅的共同标准，有了共同語言了，他也就会切实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了。

6月10日

（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文学上的观潮派

馬鉄丁

“劳动人民不仅創造了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精神財富。劳动人民及其知識界，定会写出輝煌的巨著，瑰丽的詩篇。”你这么說，他这么說，大家都这么說。有些人跟着微微点头，但并不明确表示态度。

这点头，是包含着两层意思的：一层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不得不点头；另一层是，你說劳动人民会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学嗎？心里是頗不以为然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在发展，在前进，虽然有过不算很短的历史了，可是，这批先生們还得看一看，等一等。他們是文学事业上的观潮派。

有着无限前途的新事物，不为在沒落中的旧事物所承認，那是由来已久的。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文化史上有过新学与旧学之爭，白話与文言之爭。当新学、白話开始登台的时候，那些旧学、文言的代表者，曾对新学、白話嗤之以鼻：“你算得什么东西？引車卖漿者之言！”

历史是无情的：最后胜利，不是屬於旧学，文言；而是屬於新学，白話。“你是什么东西？”用这句话来回敬旧学、文言的代表者，那是历史的真实，再确当不过的了。

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它以嶄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但是，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之流硬說：“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或大多数的文学都是不能成立的名詞”。还說：“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

时代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了。这时候，当然没有人敢于象梁实秋那样，赤裸裸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公开起来为资产阶级文学辩护。梁实秋式的思想，却并未根絕，还依附在某些人的身上。在这些人看来，提起文学，不是荷馬，莎士比亚，就是杜甫，李白，至于现代文学，社会主义的新文学那是“小把戏”，是根本算不了什么的。

历史是无情的，新事物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你承認不承認。承認，要发展，不承認也要发展。

我国各方面都在大跃进，也必然带来文学上的大跃进。可不是嗎？仅仅是半年的时间，可称为优秀的长篇小说，就出版了十几部；优秀的短篇、特写，成百成千；民歌民謠，数以亿計，其中許多不論就其思想水平或艺术水平来看，都已达到惊人成就的境地！潮在涨，浪在涌，观潮派的先生們如果不是花崗岩头脑，如果不願把自己的阶级偏見带进棺材里去，事实終会使他們醒悟的！

1958年6月15日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决心大变”颂

张春桥

看了齐白石先生的遺作展覽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进取精神。五十七岁那年，他在“老萍詩草”里写的几句话，尤其叫人感动。他說：“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心大变，不欲人知，即餓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問快心时也。”

好一个“决心大变”。正是这个“决心大变”，使白石老人的艺术生活开始了大跃进。

一个人活到白石老人那样的年紀，到了五十七岁的高齡还能“决心大变”，确实不容易。我們队伍里，有一些人，不到五十七岁，就已經盘算着怎样养老了。有的人，論年齡，不过三十多岁，思想上却早已衰老得走不动路了。別人送給他一根拐杖，还是不願上路。这样的人，当然是极少数。但是，这次反浪費、反保守运动中，我們揭露出来的各种官气、暮气，就不能說是很少了。特别是，当我们讀到白石老人那些充滿革新精神的話，看到他敢于輕視古人，“我行我道，下笔要有我章法”，敢于設想“吾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見之，亦必欽佩”，就更加感到暮气，非彻底燒光不可，就更加感到：在兴无产階級、灭資产階

級的斗争中，我們多么需要这样的“决心大变”的闖将呵！

当然，“决心大变”并不一定非要等到五十七岁不可。早几岁，早个几十岁，也不能算“年幼无知”，“目无长者”。在今天，如果我們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决心大变”，立志要在天資产階級思想、兴无产階級思想的斗争中，冲锋陷陣，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也只会受到党的支持。毛澤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講話的时候，曾經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归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鐘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这段話，充分地表达了党和革命長輩对青年一代的希望。

不錯，文艺界出过刘紹棠之类的青年。但是，誰也不会从此認為凡是青年都会变成刘紹棠，正如同老年人中也出过右派分子，不能因此就說凡是老年人就都会变成右派一样。主要的問題是，要看他們的政治方向对不对。是为了資产階級的利益“决心大变”呢，还是为了无产階級的利益“决心大变”？为資产階級的利益“决心大变”，那是一条絕路，並沒有什么“独到处”，刘紹棠們已經走过了。如果是为无产階級的利益而“决心大变”，方向对了，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跌跤，但是，只要听党的話，只要有毅力，跌倒了爬起来，坚持到底，百折不回，他們总会跑到目的地。我們的革命的前輩們，当他們認清了方向，以破竹之势，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不也还是一个青年嗎？

我們整个民族都在“决心大变”：“苦战三年，改变面

貌”，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內赶上世界最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这还不是“决心大变”嗎？并且，不是慢慢地变，而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变，大跃进式地变。我們面前的沸腾般的生活，不正是这样的嗎？

我們正处在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高潮中。为了扫清文坛上的資产階級思想影响，讓我們“决心大变”，苦战几年，根本改变文艺界的面貌吧！

4月10日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不要怕

姚文元

我們这一代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干着前人所未干过的大事业。我們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新事物蓬蓬勃勃发展和旧事物不断死亡的时代。

在文化战线上也是这样。我們的战略任务是“灭资兴无”。在我們这一辈人身上，一定要建立起压倒古人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一定要在一切学术部門中毫例外地建立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彻底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掉。要創造出一个学术文化上百花怒放的灿烂的黄金时代。

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們应当做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派，革新派，促进派。

那么，就該有革命者的魄力；不要怕。

不要怕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表现在什么人身。即使是知名之士，大学者，有资产阶级思想也仍然要斗争。事实上，有些“知名之士”现在在学术上还是不同程度地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青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这句话以后还是要用，因为以后还要长期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把一切老朽的，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思

想送进博物館去。以为以后思想战綫会风平浪靜地到共产主义，沒有根据。自然，斗争要講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只能坏事，不能战胜敌对思想。

不要怕沒有学問。学問这件事是可以学的。要下苦工夫学习，“边干边学”是我們的口号。有的人虽然学問不多，但他要前进，站在新生事物方面，有党的领导，就能够从实践中发现問題，破旧創新。米丘林李森科都不是讀万卷書的博学之士，米丘林种了几十年果园，李森科是在乡下长大的，他們从实践中出发，开创了生物学中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那么丰富的实际材料，为什么不能据以創立新的学問呢？

不要怕自我革命。有勇气改造世界的人也有勇气改造自己。“不断革命”也会革到我們自己头上来。个人主义，驕傲自滿，保守思想，落后观点……我們身上不多少也染着么？这些資产階級思想要彻底革掉它，仍旧站在形勢的前面。运动不断发展，环境不断变化，对每一个人都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們就要不断增加自己身上新的东西，丢掉旧的东西。共产主义者是永远革命派，热爱革命，在每一个革命的潮头来到的时候都是欢欣鼓舞地同群众一起前进。站在一旁对劳动人民泼冷水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不要怕創造。人类如果沒有新的創造，就不能前进；学术文化領域中如果沒有新的創造，就不能有新的发展。学习前人，永远是必要的；但被前人成果所束縛的人，却

正是离开了前人精神的人。因为那些伟大的先行者正是敢于打破成規，不受他們前人成果束縛，走上勇敢創造的道路的人，我們如果不敢提出新的問題，难道能够真正繼承前人敢于創造的伟大精神嗎？

不要怕学习。要立志学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去觀察問題。在我們这个共产主义时代，不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就一定会一事无成。那些反对、蔑視、厭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正在一批一批地被革命的浪潮抛到时代的后面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把它作为我們的指路标，我們的創造就能够經得起任何风险，我們的勇敢是建筑在真理的基础上。請看費孝通，秦兆阳，刘紹棠，雷海宗之流伪科学的“創造”者，他們的修正主义的貨色不是已經只剩下一堆破銅烂鉄了嗎？

不要怕风浪。我們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許多次战斗。各种大小风浪还会袭来。当歪风刮起来的时候，决不順风倒。“要有逆流而进的大无畏的精神”——去年鳴放期間不是就有人順风而倒嗎？无产階級立場——这个鮮明的立場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决不动摇，决不含糊。千万不能因局部的，次要的爭論而舍弃了立場，有些人就因为見叶而不見根才犯錯誤的。不怕和資產階級思想作斗争，不怕沒有學問，不怕自我革命，不怕創造，不怕学习，不怕风浪。这样，我們就能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势如破竹”地前进。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4月24日）